

《君生我未生》：在爱与痛苦中开出花朵

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张严平出版长篇回忆录，讲述她与科学家杨南生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

8年前，张严平失去挚爱杨南生，8年后，张严平用这本书回望杨南生的一生，怀念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她说，我终于用文字拥抱了他

张严平

这本书是在爱与痛苦的土壤中开出的花朵。

8年前，当我失去了挚爱，我的精神垮了。我痛苦不堪，茫然无措地活在世间，常常在清晨醒来时，不断地问自己，你为什么还要活着？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生的虚无。那时候，我就想逃到一个荒岛上，一个人都没有、特别是一个认识我的人都没有的荒岛，忘记一切，在天地间泯灭。

记忆是无法忘却的。那么多的爱，那么深的痛苦，又如何忘却？我失眠，自闭，断绝与一切人的往来，在抑郁症的边缘上下翻滚。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话：“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的灿烂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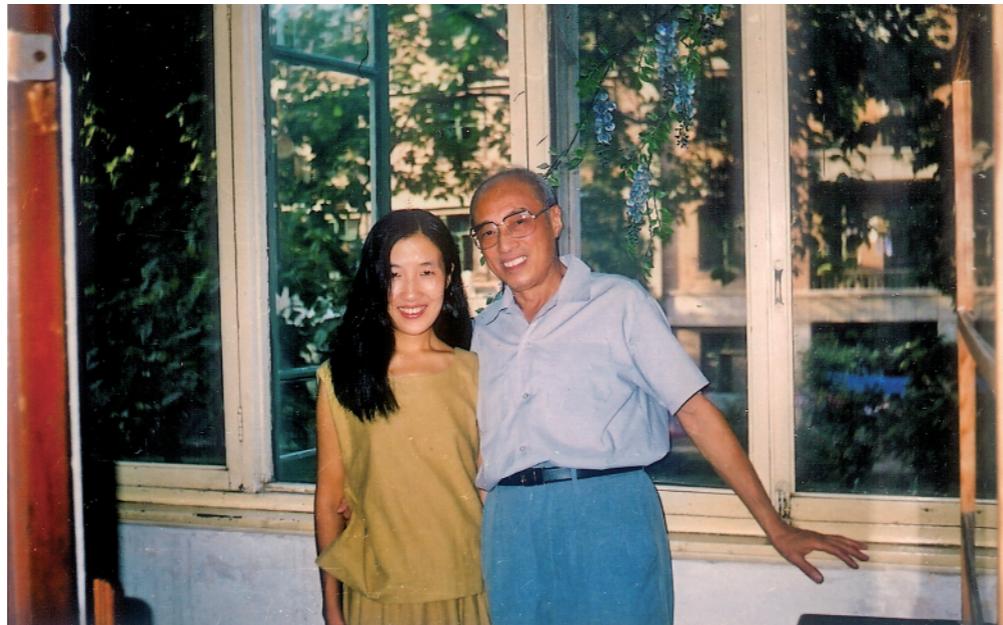
那一刻，心中犹如电闪雷鸣，我被震醒，明白了：命运馈赠我的这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以及命运赐予我的无法逃脱的心灵痛苦，正是它向我的人生投下的一片土壤，它要让我在这片土壤中历经花开花落、向死而生，最终开出不一样的生命的花朵。从那一天起，我开始记日记，把心中所有的回忆、痛苦、迷茫、绝望、挣扎……用一行行的文字接住，不断地激励自己：“我要在爱与痛苦之中开出花朵，成为一个心灵有光的人。”

7年多的寒暑春秋，每一天我都在日记中与我亲爱的人交谈，与自己交谈，把点点滴滴无法忘怀的爱倾尽笔端，刻进灵魂里；把点点滴滴肝肠寸断的痛洒在纸上，刻进灵魂里；把点点滴滴萌动在爱与痛苦中的醒悟，跃出身体的躯壳，刻进灵魂里。

记忆力会衰退，但灵魂会记住一切。

我就这样写啊记啊，有时泪雨滂沱，有时窒息无声，有时近乎崩溃，有时在寂静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那时我脑子里并没有明确日后要写出一本书。所有不甘堕落的挣扎与努力，只为无法忘却的爱，只为拯救我濒临死亡的内心。我一次十次百次千次地对自己说：“你必须活出一个比从前更好的新生命，才配得上你所得到的这份珍贵的爱，才不辜负你体验到的这份深刻的痛苦。”

到2020年7月，在失去至爱、孤独抑郁的7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下了70多本共300多万字的日记。回身望去，这7年，就像攀登一座险峻的山峰，有时一步之外就是万丈深渊，所幸，我终于没有跌落。



张严平和杨南生。作者供图

攀登拯救了我。

我在爱与痛苦的跋涉中看到了更大的天地；更清晰地认识了命运馈赠于我的是一个有着怎样高贵灵魂的爱人；前所未有的领悟了这场爱情给予我的是何等辽阔的世界；第一次懂得了痛苦对于我灵魂再造的意义，它打破了我在一帆风顺下形成的平庸与狭小，让我看到了人生更广阔更灿烂的纬度；也第一次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是一种包含着痛苦的价值、立足于真实的人生、深刻而持久的灵魂喜悦。

正是在2020年这个夏天，在我亲爱的爱人离去7年零5个月后的这个夏天，我决定写出这本书。它不在计划之中，也不在努力之内，它是我内心所有情感的洪流涌到这一天不得不喷涌而出的海浪；是在爱与苦难的土壤中，那一颗积蓄了天地之气的种子怦然破土而出的心灵的花朵。

写作的日日夜夜，我就像在旷野中、在风雨下、在山岗间奔跑的人，或者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清晨到夜晚，不吃不睡；或者踟蹰于一道河流前不知所措。有时一句话没写完，我已失声痛哭；有时我离开书桌，默默地走出房门，让蓝天和阳光灌满我悲伤的心房。写作于我就像一场痛而欣喜的疗愈，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新的生命在一天天从心灵深处生发。经历了夏天、秋天、冬天，这本书带着一个新生儿终于走到了春天的入口。惊蛰那一天，我去花店里抱回一大捧鲜花，放在日日夜夜陪伴我写作的爱人面前，轻轻地对他说：“我看到了你让我看到的宇宙。”

今天，这本书终于要出版了。我要给它插上一支传递大地之春的风信子献给我最亲爱的人——杨南生。我做了一辈子记者，采访过无数人，写出过许多人物，杨南生是我记者生涯中最早认识的采访对象之一，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写出过任何稿子的人。漫长的37年之后，在他走进我的生命，又离开我的生命之后，我终于用文字拥抱了他。深深感恩！

深地感恩他给予我的这份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深深地感恩他烈火般的一生带给我的心灵涅槃，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愿他在天堂收到这件爱的礼物，为他挚爱的小平平的成长放心高兴。

我同时愿把这本书捧在世人面前，因为我相信，这本书所传达的关于爱情、关于生命、关于灵魂、关于苦难、关于成长……等所有光明、温暖、美好、隽永的人生信念，都会在另外一个、十个、一百个……无数个频道相通的心灵中找到它的知音与共鸣。人与人相识不易，但灵魂终会认识灵魂。想象着，在这个世间有那么多相通相亲的灵魂，在不同的时空间静静地分享着彼此的生命信息，该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与幸福。

这本书也是我人生跋涉攀登途中一个个的路标。攀登还在继续，日记还在继续，把这个小小的路标插在这里，箭头始终指向有着大海的前方，我就不会迷失。在爱与痛苦中成长蜕变成为一个目光清澈、心怀远方、自由勇敢、温暖深爱的人，是我不变的方向。

在《君生我未生》出版之际，我要诚挚地感恩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热忱、心血、才华的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的杰出的出版家们，他们是这本书的知音与知己，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我要深深地感恩我的那些亲密的同事与朋友们，他们给予了我写作出版这本书以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与鼎力相助，他们是我一路向前的加油站。最后，我要感恩这本小小的书，它拯救了我，成长了我，并因为它而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收获了这么多金子般的人，金子般的心。

命运给了晚年杨南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美丽馈赠。60多岁时，刚走出丧妻痛苦期不久，一个年轻的姑娘闯进了他心里。这个姑娘就是大学毕业不久的新华社记者张严平。他们不可思议地恋爱了，并且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结为夫妻。以后的27年里，他们相濡以沫，过着普通生活，体验着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又以浪漫的情怀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着人生的快乐与满足感。

张陵

张严平的长篇回忆录《君生我未生》是一部好书，而且是一部不同凡响的好书。作品用一个妻子深情的眼睛，回望中国固体火箭科学家杨南生的一生，用一个女性的细腻心灵，去感受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读来感人至深。

科学家的传记，多重理性，重逻辑，而《君生我未生》则重情感，重感觉，有许多独家材料和独有感受，对读者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和解读传主，打开了新的空间，提供了独特的思考。

杨南生早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自然哲学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实业报国”的理想赤子之心，冲破阻挠，回到祖国，先是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参与研制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后调到中科院力学所，加入钱学森领导的科研团队，参与了中国第一枚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的研发工作。几十年里，他一直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科研基地工作，把自己的所有心血和才智都献给了火箭科学事业。

在同批回国的科学家中，杨南生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觉地把个人的爱国主义理想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中，体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担当。1964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副院长，在钱学森领导下，接受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任务。

中国要搞洲际导弹，就必须先把大型固体发动机研制出来。可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有能力研制火箭固体燃料，我国在这方面属于一穷二白。西方国家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连当时还比较友好的苏联也不让我们知道。杨南生团队就是在这样无资料、二无人才、三无设备的情况下，经过多年科学攻关和反复试验，一点一滴培养着自己的人才，一点一滴打开口子，积累着中国固体发动机的经验，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中国有了自己的固体发动机。

今天的航空领域运载火箭，都采用了固体技术。可见，杨南生的研究是带有科技前瞻性和国家战略意义的。这方面，他付出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心血，说他为中国火箭固体发动机之父，也不为过。然而，由于历史和工作的原因，他的名字还很少被提到。直到2018年《杨南生传》的出版，社会才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位没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功勋科学家。

命运给了晚年杨南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美丽馈赠。60多岁时，刚走出丧妻痛苦期不久，一个年轻的姑娘闯进了他心里。这个姑娘就是大学毕业不久的新华社记者张严平。他们不可思议地恋爱了，并且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结为夫妻。以后的27年里，他们相濡以沫，过着普通生活，体验着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又以浪漫的情怀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着人生的快乐与满足感。

作者用自己的心呼唤着人间真情，呼唤着爱和美，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凝聚起科学家杨南生榜样的力量，《君生我未生》这部作品由此突显出深刻的主题，充实着丰盈的内涵，可读而动人。

这样充满戏剧“对立”的角色，您满意吗？

周梅森：《突围》这部戏，演员表现出了齐本安这个角色的复杂性，这个人物不是没有软弱的一面，不是没有犹豫的一面，也不是没有要退却，但是这么一个角色，最终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抗争到底。

我个人也非常尊敬林满江的扮演者，表演入木三分，很到位。我当初写林满江这个人物，确实太过瘾了。我建议感兴趣的朋友，还是看看书，看看书就可以更加了解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草地：您觉得个人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周梅森：我想，总要有一部分作家去关注现实生活，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不能装作“看不见”。所以尽管有很多的磨难，但是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家，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从事这种职业劳动。

草地：有人说，“周梅森真敢写！”在触碰社会痛点时，您如何平衡戏剧张力与真实感之间偶尔的矛盾？

周梅森：我真没觉得我写的东西尺度大。作为一个作家，我只是尽量客观地描述了我所处的时代风貌，奉献出这个时代“清明上河图”。虽然触碰到不少社会痛点，但我写这些作品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能及时纠错，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我的作品总是面对社会现实，直面很多尖锐问题，我是力求讲真话。

草地：您觉得要创作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

周梅森：我觉得，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本质。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创造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一页历史，同时也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么一个“崛起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这都很正常。要有勇气正视这些矛盾，不能“闭上眼睛”，因为真实是作品的生命。

的高贵和爱情的美好，由此谱写了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中最为华彩的激情篇章。《君生我未生》就是这样展开他们27年感情生活的细节。

作品没有过多地展现杨南生科学家的生活，而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述杨南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讲述传统文化人家庭的出身对他思想的影响，讲述他对古典音乐的修养，讲述他对文学的热爱和独到的见解。讲述他与张严平恋爱时那些浪漫的事。这个时候的杨南生，用张严平的话，就是一个“如蓝天一般纯粹的人”。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普通人杨南生的困窘与无奈远远要超过科学家杨南生，天一点也不蓝，反而阴霾重重。他人到北京生活了，关系却几十年进不来，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奏效。居室常年漏雨，也没有人来帮着修理。他出身大户人家却一生清贫，不看重物质财富，只重精神追求，过着简朴平淡的日子。他淡泊名利，为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却甘做人梯，与世无争。

当那些在他研究基础上取得成就，而不提他功劳的现象不断发生时，他却从不计较，云淡风轻而过。当国庆大典中，中国的导弹经过天安门时，风烛残年的他边在自己小屋里看电视前实况转播，边回忆自己当年的风采和荣光。在这些作者自然而然讲述出来的故事中，我们能读出杨南生的个性品质、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能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老一代共产党人从不计个人得失的人格魅力和纯净的心灵。

对杨南生来说，对生活的馈赠已经充满感激。他一生为国家民族工作，晚年还得到了真挚的爱情。他已经非常满足于生活对他的钟爱。所以他一方面为国家发挥余热，一方面格外珍惜自己的爱情。从他与妻子的两地书信里，我们读出了他对妻子浓厚的情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常人很难有的满足感，也读出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可以看出，《君生我未生》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有思想境界、有文化品位的人。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她心中有社会大局的国家意识，深知一个科学家的道德价值。作为一个妻子，她常常会为杨南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境遇所不平。然而，更多的时候，她爱着，并被这颗值得爱的灵魂所吸引所指引，向着人生更高的境界升华。爱人在世的时候，她被爱人的精神所感动；爱人离世以后，她用每天的日记守望着感受这颗伟大的灵魂，向一个纯粹的人的灵魂靠近，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生，以爱和宽容面对生活，也成为一个“蓝天一般纯粹的人”。

今天的航空领域运载火箭，都采用了固体技术。可见，杨南生的研究是带有科技前瞻性和国家战略意义的。这方面，他付出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心血，说他为中国火箭固体发动机之父，也不为过。然而，由于历史和工作的原因，他的名字还很少被提到。直到2018年《杨南生传》的出版，社会才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位没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功勋科学家。

命运给了晚年杨南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美丽馈赠。60多岁时，刚走出丧妻痛苦期不久，一个年轻的姑娘闯进了他心里。这个姑娘就是大学毕业不久的新华社记者张严平。他们不可思议地恋爱了，并且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结为夫妻。以后的27年里，他们相濡以沫，过着普通生活，体验着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又以浪漫的情怀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着人生的快乐与满足感。

作者用自己的心呼唤着人间真情，呼唤着爱和美，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凝聚起科学家杨南生榜样的力量，《君生我未生》这部作品由此突显出深刻的主题，充实着丰盈的内涵，可读而动人。

从《人民的名义》到《人民的财产》

专访作家周梅森

改革过程中的深度问题剖析，就创作本身而言，是否有时间先后之分，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对国企改革题材产生兴趣？

周梅森：好像不能分割得这么清楚。我的作品里都会有些案件，只是有时为主，有时为辅。《人民的名义》以案件为主，《人民的财产》以案件为辅；前者社会层面展示较少，仅一个大风厂。后者展示得相对较多，以国企中福集团为主线，涉及当今社会各方面人物。

对国企改革和改革过程中的痛点难点，我一直很关注。20世纪90年代我的作品《人间正道》就触及了国企问题，不过比较浅。嗣后，我开始密切追踪一些大型国企，和一些企业家成了朋友，除了这部讲问题的《人民的财产》，还有一部《大博弈》，讲装备制造业国企艰难改革，勇敢博奕，冲入“世界500强”的故事，也拍成了同名电视剧，如果顺利，将在2022年播出，小说也将同时推出。

草地：您对国企改革和转型的小说选题，显然带着一种执念和挚爱，为什么？

周梅森：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与国企密切关联的家庭，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国企工作，有的目前还在。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人生中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段岁月写出来，这一直是我非常惦记的一个题材。

草地：《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侧重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仿佛是一幅描绘社会百态的长卷，其中人物塑造刻画、社会现象捕捉，均十分传神，这是如何做到的？

周梅森：最近20年我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上好的坏的都有，这势必也会

对我的创作内容产生影响。

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来自生活。我和每个中国老百姓一样，追求富足。这些年我也涉足过经济领域，赚过钱，也亏过本。《人民的财产》中，钱荣成、傅长明这种人，我都打过交道，也吃过他们的亏；其中的师门三兄妹形象，实际上就是我青年时代在矿山经历的一些人和事。这些人和事烂熟于心，总有一天会在你哪部作品里冒出来。生活是我写作的“宝藏”。

挑战自己的乐趣远大于市场成功

草地：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要占到您创作周期的多大比例？深入生活观察捕捉的细节，与采访一些现象性人物，您会更侧重哪方面素材的收集归纳？

周梅森：我是作家，不是记者，我写的不是纪实报道，是虚构类的文艺作品，所以人物和事件都不会是真实发生过的原始事件。对一些现象性人物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交朋友。我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创作帮助很大。

我的作品中，都不能说有原型，像创作《人民的名义》，是有很多案件、大量的企业、大量的社会事件，我都看到了，也进行了研究，有些读者就问，是不是写了“哪一个”？我说，我没有写任何“哪一家”企业，我实际上是综合了各家企业的故事，综合了各式人物。我的作品毕竟不是纪实文学，它是电视剧、是小说，是虚构的。

一个作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融会贯通力。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新闻报道，追踪我感兴趣的新闻事件，验证我的分析判断。有时也许只言片语吸引了我，我就会发挥我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加上我丰富的阅历，这点小事也许就是我日后小说里的重要细节，甚至触发我的灵感，让我写出一部小说来。对我具象性的人物从不采访，只和他们吃饭聊天交朋友，抓住他们最具灵性的東西就可以了。

草地：《人民的财产》小说开篇，就巧妙交代了中福集团的革命“家史”，企业的“基因”与新中国史、中国革命史、现代化史融为一体，此后又贯穿在主人公的结构关系和情节推进中，这个引子故事，能否概括您当初创作这部作品的一种初心？

周梅森：这是一个创作者的野心造就的格局，想创造一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对我这个年龄的作家来说，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的乐趣，远大于市场成功的乐趣。

和我同时代的作家，受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影响的较多，而我受秘鲁作家略萨的影响较大。略萨是结构大师，我曾把他的作品拆散了分析，所以我的作品尤其是剧作，都是复式结构，多线索齐头并进。这部戏又加上了历史，就更复杂多彩，这也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观照，让人们思索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矛盾面前，作家不能“闭上眼睛”

草地：谈谈以《人民的财产》为蓝本拍摄的影视剧《突围》，其中塑造的林满江、齐本安

本报记者许晓青、蒋芳

2017年，一部名叫《人民的名义》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引起全国轰动，满满正义感的侯亮平、赵东来与反面人物高育良、祁同伟等，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事实上，这部反腐大剧拍摄期间，原著作、著名小说家周梅森已经开始了另一个“大计划”——小说《人民的财产》（影视剧名《突围》）的创作。

2021年秋，《人民的财产》也成功走上影视化之路，长篇电视连续剧《突围》开播，屏幕上林满江、石红杏、齐本安组成的“师门铁三角”，从工矿一线走上企领导岗位，社会的嬗变、改革的艰辛，宛如一幅当代国企发展的“清明上河图”，引发观众共鸣。

从《人民的名义》到《人民的财产》，周梅森为当代读者和观众构建起富有个人特点和情怀担当的小说体系，这其中饱含着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痛点难点的反思。

近日，周梅森